

论 文 提 要

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运动形态。但无论是农民起义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解放妇女;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也不能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妇女解放诸说纷呈。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不能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正确途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道路也行不通。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观察妇女问题的工具,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妇女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妇女运动制定了正确的纲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就在党领导之下,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妇女运动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也就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前途。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女工、农妇被广泛发动起来,女权运动不断分化。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战胜了其他流派,成为有着广阔规模、持久生命力和广泛群众基础,并且最能使妇女得到解放的运动形态。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选择。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

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选择

李静之

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伴而生。中国妇女运动诞生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经历了由资产阶级领导到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转变。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运动形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劳动妇女为基础并团结各阶层妇女的、同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流，成为引导中国妇女解放走向胜利途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运动形态。中国妇女是如何选择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

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解放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里，中国妇女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形体的摧残，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婚姻等方面同男子处于不平等地位，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她们从整体上不具备独立的人格，精神上被压抑，铸成自卑、自弱、狭隘、依附等传统心理。劳动妇女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深重，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明、清时期，在李贽、俞正燮、曹雪芹、李汝珍等进步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中，提出了反对男尊女卑和夫权压迫，反对贞操观念，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婚姻自由的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升华为系统的男女平等理论。中国女性尚在沉睡，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妇女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响起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前奏曲。天国领导人提出了男女平等口号，实行了一些有利妇女解放的政策，并且注意发挥妇女的作用，发动了号称 10 万的女兵参加起义。但是，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产生近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妇女依旧遭受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参加起义的妇女大都是农妇，她们也不可能产生做一个独立的人的自立意识和对自身解放的追求。因此没有形成近代意义的妇女运动。历史告诉人们，农民起义运动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

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为武器，提出“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发展女子教育以及女子经济独立思想和主张，他们把妇女解放同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选择禁缠足、兴女学两个关系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对封建势力举起了叛帜。少数知识妇女在变法思想影响下开始觉醒，提出了自身解放的种种要求。这表明，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已经揭开，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即将走上历史舞台。但是，由于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提出的解放妇女的办法是枝节的，没有触动封建宗法制度，他们又不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斗争，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主张必然失败。历史告诉人们，资产阶

级改良运动也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诞生了以妇女为主体、有纲领、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妇女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鲜明地提出,妇女应挣脱封建家长制和父权、夫权的束缚,争取“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以及参政权利,主张妇女解放应同反清革命、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联在一起。这曾鼓舞和吸引一代青年知识妇女投身革命运动,锻炼培育了秋瑾、何香凝为代表的女革命家和妇女解放先驱。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光复会的女会员以各种方式参加十次武装起义,之后,她们又掀起女子军运动,“仆仆征途,风霜跋涉”^①,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中国妇女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他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②。认为“此次革命,女界亦有功”^③。

正是在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中国妇女第一次组成队伍,结成团体,提出了争取解放的斗争纲领;她们开始认识到必须通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来争取妇女解放,使妇女运动与反清革命合流。这场持续多年的妇女运动,以过去从未有的姿态,开创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篇章,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④。

民国建立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妇女把争取女权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开展了争取教育、就业、参政诸方面权利的斗争。为了能在《临时约法》上确立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西方女子参政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激进的女同盟会员发起了女子参政运动,仿效西方女权主义者闯议会、砸门窗,一度迸发出几束耀眼的光芒。但是,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反应冷淡,不仅不加支持,甚至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党纲中,竟然不顾女同盟会员强烈反对,删去了原同盟会政纲的“主张男女平等”条文。这对正在为争取参政权而斗争的妇女,无疑是极大的打击。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女子参政运动也遭到封建军阀政府镇压,不久便消沉下去。辛亥革命时期颇有声势的妇女运动跌入低谷,一度批判过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重被奉为圣典,贞女、节妇头上又戴上圣洁的光环。共和国的招牌并没有使中国妇女摆脱被奴役、受压迫的处境,她们仍然被三座大山重重的压榨着、被四条绳索紧紧捆绑着。

历史告诉人们,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封建不彻底性,决定了它不能领导中国妇女运动走向胜利,不能给中国妇女带来真正解放。还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独立的女权运动无法存在下去,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

在“五四”时期绽开新蕾

中国妇女运动如何走出低谷?中国妇女怎样才能获得真正解放?这是20世纪初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五四运动启开了中国革命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妇女运动带来了生机。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妇女解放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一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⑤。1918年《新青年》4卷5期

登载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及尔后开展的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是新文化战士以贞操为突破口，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第一次冲击。1918年《新青年》4卷6期的易卜生号，将挪威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及其名作《娜拉》介绍到中国。这部以揭露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制度的剧本刊登和上演，犹如石破天惊，“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②，震醒了不少知识妇女，鼓舞着她们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争取做人的权利。“当时到处上演《娜拉》，高叫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许多前进的妇女，并以行动，勇敢地冲破了旧有的藩篱。风气所及，使那些‘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③。但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妇女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回答。

五四时期，西方女权主义也伴随人权学说被大量介绍进来。美国纪尔曼《妇女与经济》一书阐述的“妇女唯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观点，对知识妇女颇有吸引力。瑞典爱伦·凯的《自由结婚与离婚》，日本厨川白村的《恋爱与自由》，英国嘉本特的《爱的成年》等的介绍，以及《新青年》等报刊对欧美妇女参政、就业情况的报导，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引起对妇女教育、就业、参政、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出现了争取男女社交公开、争取男女教育平等、争取女子经济独立、争取婚姻自主以及要求女子参政的热潮。“谋政权的平等，而妇女参政权的呼声举”，“谋经济权的平等，而妇女职业活动的开放兴”，“谋知识的平等，而男女同学的禁例开”，“谋道德的解放，而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理论倡”^④的说法，大体可以概括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主张。人们并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出现了女子心理解放派、女子教育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改组家庭派、儿童公育派、限制生育派、女子工读派等不同流派。

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和流派，主要反映知识妇女的要求，并不能代表劳动妇女的利益和需要，更不触及现存的社会制度，因此必然找不到妇女解放的正确方向和途径。但由于新文化运动启发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一些女学生开始冲破封建锁链，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

与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大量输入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妇女运动。起初，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主张一度对中国妇女运动影响较大。

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呼声格外高涨，青年们向往的是一个不仅超过贫穷落后的中国，而且超过已暴露出种种弊端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因此，当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新思潮面目出现时，一些青年不但接受了，并以极大的热情设计、组织、实践这个理想，也试图用它来解决妇女问题。如：他们根据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讨论在这个乌托邦的“新村”中，如何使妇女能够维持独立的生活；根据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主张青年男女脱离封建大家庭，建立田野生活的新家庭，等等。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对妇女运动的影响最大。无政府主义认为，要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首先要消灭家庭，为此必须消灭婚制，或者过自由恋爱、自由性交的杯水主义的极端放纵自由的生活，或者在社会不能解决儿童公育、公共养老院时“暂抱独身主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因此开展了一场关于“废婚”与“废家庭”的讨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一些青年中更引起不小反响，王光祈组织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在不少女青年心中燃起希望之光，她们企望通过半工半读获得经济独立，以摆脱旧家庭的束缚和不幸婚姻的压迫。女子工读互助团不仅在北京出现了，上海、广州、天津也出现过。但不久，都因经费无着等原因而消声匿迹。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证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道路走不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关心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观察中国妇女命运的工

具。当时的《新青年》和其他进步刊物，大量报导十月革命后苏俄妇女地位的变化和获得解放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等著作部分章节被翻译过来；列宁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不断见于报刊；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也被介绍到中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观察、研究妇女问题的成果表现在：

一、用唯物史观解释妇女问题，观察妇女历史地位、贞操观念和家族制度的变化，认为都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连在一起。这方面杰出的代表是李大钊。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著述，是中国最早用唯物史观研究妇女问题的代表作。李大钊详细分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妇女地位变化同经济的关系，正确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妇女在社会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运用道德同物质关系的原理，说明贞操观念“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⑧他还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父权家长制的大家族制度”进行了透彻地剖析，揭示了中国妇女被压迫的状况和受压迫的深层原因。

二、用阶级观点分析妇女问题，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李大钊在《战后妇女问题》、《现代女权运动》等文章中，对女权运动进行了阶级分析，一方面肯定女权运动对“力的法则”的反抗，说“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⑨；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关心的只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妇女的问题。“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⑩，中产阶级妇女权利的扩大，并不是全体妇女的解放。他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⑪。陈独秀也指出，要解决妇女问题，“非用阶级斗争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⑫。

三、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理论，指出妇女运动的中心要转到劳动妇女方面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在《我想（二）》一文中把“女人运动”分成两大类，一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一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他认为这两类运动宗旨是不同的，“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前者“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而后者“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⑬。田汉则指出，“第三阶级的女子对于第四阶级的女子利害根本不同，虽然同性，好象相斥似的。第四阶级的女子与第四阶级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虽然异性，转有同病相怜之妙”^⑭。李大钊更明确地说：“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⑮，他们认为，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妇女运动应该联合，不过不能把第三阶级妇女运动看作主体，而要将妇女运动的中心移到第四阶级上来。

四、指出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演说中提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他认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要参加社会公共劳动，女子才能摆脱依附地位，有独立的人格。他说，“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⑯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妇女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已不局限在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也否定了单纯通过争取女权来解放妇女的主张。他们正确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把妇女解放置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总目标之下,为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一批知识妇女开始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作为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帮助她们从女权运动中分化出来,加入到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行列,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为党制定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乘隙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女工在工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1919年占全国工人总数44.7%)。她们的悲惨命运和争取生存权利的强烈要求,必然对中国妇女运动发生深刻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1922年这一年,全国有30余万工人举行了100次以上罢工,其中女工罢工的工厂有60余个,罢工人数达3万余,罢工次数18次^①。女工们以阶级反抗形式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斗争,给妇女运动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而兴起的劳动妇女运动,初期虽比较幼稚,但却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它使许多先进的知识妇女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前途,认识到“不与无产阶级携手的妇女运动,不是真正的妇女运动”^②,只有把妇女运动的中心从第三阶级移到第四阶级,才有妇女解放事业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女工运动的兴起,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各种妇女解放思潮和流派较量中绽开的新蕾。经历过五四反帝反封建战斗洗礼的先进知识妇女,逐渐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走上同劳动妇女相结合、投身民族民主革命以谋求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妇女运动开始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无产阶级妇女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

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国妇女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彻底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及解放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使命出发,自觉地将领导妇女争取解放视为己任,从它创建之时起,就把妇女运动纳入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1921年8月,党帮助在上海的女权组织中华女界联合会实行改组,改组后的纲领除列举同等教育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继承权、就业权等争取男女平等的一般要求外,并提出“拥护女工及童工底权利”、“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活动”、“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底群众运动”、“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等主张^③。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思想,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纲领的色彩。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党的第一个妇女运动的纲领。决议认定,“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④这不仅揭示了妇女解放的阶级性质,为妇女运动制定了奋斗目标和纲领,而且指出了达到目标的正确道路,明确指出妇女解放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独立进行。这是对

中国种种妇女解放主张的一次总清理,划清了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理论界限,开辟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新时期。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紧紧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妇女运动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而遭受挫折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影响逐步扩大,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也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前途。

但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并没有销声匿迹。它虽然没有成为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中独立发展的运动形态,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但却时起时伏,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走完了自己的历史里程。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必须对这种思潮和运动形态加以正确引导。

1921年到1922年间,女权运动出现过一次高潮。1921年,女权运动以联省自治运动为契机开始复活,其目标是要求制定省的地方宪法时承认女子的公民权利。广东妇女率先发起参政运动,10名妇女当选为议员。接着,长沙女界联合会发起的争取财产均分权、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教育平等权、职业平等权、婚姻自决权的“五权运动”,也有妇女当选为省议员和县议员。其后,四川、浙江等省妇女经过斗争,获得了选举权。各地女权运动的结果,不过是在地方政府里增加几个女议员,随着联省自治的失败,也就无声无息了。1922年,旧国会恢复,大唱制宪高调,一个争取在国家宪法上规定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高涨起来,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女学生组成了女子参政协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并在上海、天津、南京、湖北等地成立了分会。但是,封建军阀政府不可能真正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更不会保障女权,靠合法斗争也不可能冲破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女权运动同当时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一样,必须另找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女权运动同盟会中的一些进步的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在封建军阀尚未推翻,民主政权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要争取女权,必须先从军阀手中夺回政权。这就有可能帮助她们走上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道路。

根据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的统一战线方针,三大《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及“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时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妇女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①党的妇女部长向警予连续撰文,批评女权运动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脱离劳工妇女,指出“呻吟憔悴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两重压迫之下的中国,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中国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不能“死板板的呆学十八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她说“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②在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党的妇女组织努力争取和团结各地女权运动组织,扩大各界妇女的革命联合。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各地妇女也组成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有妇女团体参加,抗议善后会议剥夺女权。党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的时候,注意把争取女权和争民权结合起来,要求她们“一个肩肘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肘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一面力争妇女在国民会议中的地位,一面就是促成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③通过向警予等的工作,这次运动突破了以往几次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只在少数上层知识妇女中活动的圈子,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女学生和职业妇女参加,地区上也比较广泛,使运动开始呈现群众化趋势。女界国民会议运动是一次女权运动,但它超出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狭隘眼界,是一次把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权运动结合起来的新式女权运动。它虽然同整个国民会议运动一样,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其本身的预期目标,但却是中国妇女把争取自身权利

的斗争同反帝反封建斗争自觉结合起来的开端和起点,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⑧!

到1925年,中国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会议运动这样的和平的民主运动已不适于新的情况了,长期积累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终于演变为1925—1927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把历史积累的各种矛盾都掀动起来,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终于不可遏制地大规模爆发。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⑨。在党的工农妇女为基础的思想指引下,以五卅为开端、北伐战争中掀起高潮的劳动妇女运动蓬勃兴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参加五卅反帝罢工的女工,仅上海一地就有16万。这次运动还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由通都大邑传到穷乡僻壤,使不少农妇接受了革命洗礼。在五卅运动中,参加各地政治示威的劳动妇女多达200万人,组织在工会和农民协会中的妇女不下50万。广大女学生同劳动妇女一起参加反帝斗争,标志着相当多的知识妇女已脱离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巢臼,投向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洪流了。

五卅运动是大革命的盛大揭幕典礼,此后便开始了疾风暴雨的群众武装斗争。五卅运动中工、农、知识妇女的广泛发动,为北伐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准备了群众基础。

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从广东誓师北伐,只用了八个月时间,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半个中国。这巨大的胜利是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劳动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农村妇女是劳动妇女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伐开始后,农民运动在许多地区蓬勃发展,农妇们也剪掉“巴巴头”,扔掉缠脚布,同男人一起打菩萨、砸神庙,成为农村反封建的重要力量。1926年9月党的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预见到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要求各地“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并“开始准备作农妇运动的人才”^⑩,这是党的妇女运动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北伐战争的革命风雷,震撼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跃上革命前线,从支前参战到武装起义,从反帝示威到收回租界,……到处都显示着妇女特殊的战斗力。她们冲毁了囚禁自己的牢狱,高举着解放的旗帜,且战且进,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组织,用群体的奋斗提出自身解放的种种要求,努力挣脱封建宗法社会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反抗一切压迫女性的传统。由于她们对革命做出了贡献,发挥了作用,她们的要求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更加速了自身解放的进程。实践证明,只有参加到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中,妇女才能同被压迫人民一起获得解放。

随着革命的深入,女权运动分化。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正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获得人权、民权,妇女才有女权,从而投身国民革命洪流,与工农劳动妇女并肩前进;另一部分始终抱着参政宗旨,热衷于做女议员,羞与劳动妇女为伍,渐渐脱离群众,无声无息;极少数人依附资产阶级右派,成为妇女运动的阻力。

在大革命高潮中妇女运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妇女解放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妇女解放道路也得到明确概括。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成了妇女运动的主流。

大革命失败,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也遭受挫折。为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而奋战过的妇女,或

是血溅刑场，或是身陷囹圄，或是潜伏地下，或是转战山野；也有的俯首于反动派之前，或沉溺于温柔之乡。以后十年，妇女运动朝两个不同方向发展。

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后，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重又打起“提高女权”的旗号，向南京政府要求参政权。虽然争到了几名国民会议的代表名额，但她们所提的修改民法亲属编、禁止娼妓、推广女子中等教育、禁止蓄婢、纳妾、缠足等提案，无一获得结果，劳动妇女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且，歧视、摧残女性的逆流泛滥，贤妻良母主义、回厨房运动、花瓶制度、男女分校决定等，都是对提高女权的讽刺。表明女权运动已走向末路，除了极少数人做官、当议员外，它再也搞不了什么推动妇女解放的活动了。

与此不同的是，在苏区，以农妇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却获得重大发展。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农妇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任务。这个决议对农村妇女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来”^⑧。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形成，占妇女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开始崛起，成为建设和保卫红色根据地的生力军，推动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重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和妇女群众的特殊要求，为妇女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动工农劳动妇女并广泛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广大妇女英勇地投入波澜壮阔的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革命洪流，以无私的奉献，参与构筑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参与建造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可以说，“没有占人口一半妇女的英勇奋斗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⑨。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和自身素质也不断提高，特殊利益得到保护。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获得重大发展。

中国妇女对革命变革的巨大参与活动和出色成就，赢得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所以在革命胜利后，获得了法律上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和广泛的权利，并在实际生活中逐步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伟大胜利。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劳动妇女为基础并团结各阶层妇女的、同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有着广阔规模、持久生命力和广泛群众基础的妇女运动形态，也是最能实现妇女解放目标的运动形态。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战胜其他流派，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主流，是历史的必然，代表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选择，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选择。

注。

- ①《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91 页。
- ②《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2—53 页。
- ③同上，第 561 页。
- ④杨之华，《中国妇女之状况与国民革命》，《中国妇女》第 14 期，1926 年 5 月 10 日。
- ⑤《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
- ⑥娜拉对丈夫说的话。
- ⑦陈素，《五四与妇女解放运动》，《五四回忆录》下，第 1020 页。
- ⑧吉生，《妇女运动的经路》，《妇女评论》第 20 期。
- ⑨《李大钊文集》下，第 143—146 页。
- ⑩《李大钊文集》下，第 513 页。
- ⑪《李大钊文集》上，第 639 页。
- ⑫《李大钊文集》上，第 640 页。
- ⑬《独秀文存》卷四，第 224 页。
- ⑭《新妇女》第 4 卷第 4 号。
- ⑮《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4 期。
- 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 25 期。
- ⑰《广东群报》1921 年 1 月 31 日。
- ⑱《前锋》第 1 期，1923 年 7 月 1 日。
- ⑲虚苦，《对于目前妇女运动说几句话》，《妇女声》第 5 期。
- ⑳《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1921 年 9 月 1 日。
- 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1981 年 12 月出版。
- ㉒同上。
- ㉓《妇女杂志》第 10 卷第 1 号，1924 年 1 月 1 日。
- ㉔《妇女周报》第 79 期，1925 年 3 月 29 日。
- ㉕《妇女周报》第 68 期，1925 年 1 月 11 日。
- 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1981 年 12 月出版。
- ㉗《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1980 年 5 月版。
- ㉘《妇运史研究资料》第 5 期，1982 年 9 月 10 日。
- ㉙《中国妇女运动史》序言。